

多维的世界与多维的思维

国际问题研究方法概论

陈启达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维的世界与多维的思维：国际问题研究方法概论/陈启达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ISBN 7-80009-539-8

I. 多… II. 陈… III. 国际问题-研究方法 IV. D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2532 号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10008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48 千字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1.00 元

前 言

本书笔者自 1950 年投身于国际问题研究事业，至今已近 50 年，一直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及其前身工作，曾先后担任南亚研究、世界综合研究和第三世界研究的主持人。其间目睹了国际斗争的风风雨雨甚至惊涛骇浪，阅读了大量国内外书刊资料，也编写了不少有关问题的文章，从而对国际关系及其变化的轨迹有了比较深切的认识，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方法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其间又曾作为国际学术交流学者访问了美、加、英、荷、瑞（典）、瑞（士）、印（度）、韩等国，从而吸收了外国学者的一些研究方法。1983 年至 1995 年，笔者还曾担任国际关系学院的兼职教授，专门对该校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生讲授国际问题研究方法课程。笔者借此把过去积累的比较零散的工作经验加以系统化，使之成为一套比较完整的研究方法教材。1996 年笔者离休后，又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概括和提高，最终整理成本书。所以本书可以说是以研究实践为基础、偏重于实用价值的一份关于国际问题研究方法的经验总结。

但本书决非以狭隘的经验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事实上，笔者在总结研究工作经验时，始终以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这从本书的纲目中就可看出（虽然在个别具体问题上由于时代的变迁而难免有些不同的看法）。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理论成为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因此，笔者在重新整理工作经验时，又增加以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笔者在研究工作的岗位上经历的50年中，大部分时间世界都处于冷战时期。当时的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都带有冷战的烙印。因此，本书在取材上不能不“厚今薄古”，以近10年特别是近5年为重点。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广大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在思想上的再度解放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迅猛开展，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工作已有明显的进步，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文章。但仍赶不上21世纪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赶不上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也赶不上我国空前提高的国际地位的需要。不少文章只是就事论事地作一些评述，缺乏令人耳目一新的真知灼见；还有一些文章更是人云亦云，造成了“在原有水平上重复”的现象。出现这种不足的根本原因是认识水平上存在一些问题，但不可否认也是由于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一些缺陷。笔者编写本书的目的即是试图为弥补这种缺陷提供一些帮助。

据笔者观察，这些缺陷集中表现在没有完全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亦即没有用多维的思维来研究多维的世界。笔者认为，客观世界充满着多维的辩证关系，在国际问题领域中主要表现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阶级因素与非阶级因素之间、历史的继承性与历史的变异性

之间、正面因素与反面因素之间、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之间、宏观与微观之间、性质与数量之间、内因与外因之间、共性与特性之间的九对关系中。正确的研究方法应该全面地掌握这九对关系的两个方面，而不能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当然，在不同的时候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偏重，但有些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往往不自觉地过分偏重一个方面而轻视另一个方面，比较突出的有偏重正面因素而轻视反面因素，偏重宏观而轻视微观、偏重历史的继承性而轻视历史的变异性，等等。但实际上，被轻视的那些方面却往往是研究工作走向深入的关键所在。仅举微观研究一项为例。朱镕基总理1999年4月访美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的演说中运用微观分析的方法来谈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问题，得出了令人信服的宏观结论。因此，本书把对上述九对关系中各自的两个方面的研究辩证地结合起来，作为纲目。除此之外，还附带谈了问题研究与对策建议相结合，连同以上九对关系，共计提出十个“相结合”，作为全书的完整体系。

笔者在国际关系学院讲课的经历说明，引用具体的例子说明问题比抽象地谈论问题的效果要好。因此在编写本书时花了大力气来收集和精选适当的例子。一般情况下，书中每提出一个论点即列举2—3个例子，个别情况下可多达6个例子。

需要说明两点，一是本书所吸收的国外研究方法都已融化在本书的体系之中，不再单独作介绍；二是本书引用外国作者的文章作例子时都是用来说明本书所列的研究方法，原作者并不一定有使用这些方法的本意。至于国外关

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专门理论，如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等，国内已有人作了专门介绍，读者自可择善而从，本书恕不赘言。

最后必须声明，由于本书笔者水平有限，加以国内缺乏以马克思主义作理论基础的有关国际问题研究方法的论著可作参考，本书难免有错误之处，恳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1999年4月16日

目 录

1. 经济基础研究与上层建筑
研究相结合 (1)
2. 阶级因素研究与与非阶级因素
研究相结合 (13)
3. 历史继承性研究与历史变异性
研究相结合 (23)
4. 正面因素研究与反面因素
研究相结合 (53)
5. 主要矛盾研究与非主要矛盾
研究相结合 (80)
6.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 (91)
7.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115)
8. 内因研究与外因研究相结合 (128)
9. 共性研究与特性研究相结合 (136)
10. 问题研究与对策建议相结合 (159)

1

经济基础研究与 上层建筑研究相结合

这里要先讲 50 年代本书笔者最初涉足国际问题研究时亲身经历的一个事例。1951 年春,美国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决定及早与日本片面签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条约。当时我作为一名新手,负责协助所在单位的一位资深研究人员收集有关资料。我提供了不少自以为能说明美国意图的资料,但那位老同志却认为都是些老生常谈,无助于对问题的深入。有一次,我从美国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美国衬衣商人抱怨廉价的日本衬衣充斥美国市场。不想这条消息却受到了那位老同志的重视。他对我说,美国要扶植日本抗衡中国的战略意图已经众人皆知,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应该更深入一步,言人之所未言。例如可以追究一下美国此举的经济原因何在。美国衬衣商人的抱怨就很能说明问题,可以从中由小见大。原来日本战前的市场主要在亚洲,但战后由于日本未与外国签订和约,它对亚洲的出口受

阻，货物只好集中涌向美国，衬衣即其一斑。美国既要扶植日本，又要避免日货在美泛滥，最好的办法便是通过缔结和约为日本货重新打开在亚洲的出路。经他这么一说，我才知道**研究经济基础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其实，这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要求。其后笔者的长期工作经历说明，这也是各国进行国际问题研究的通用方法。

例一 1994年10月，以美国为一方，以法国和俄罗斯为另一方，围绕着是否解除因海湾战争而对伊拉克施加的经济制裁问题出现了分歧。美国坚持继续制裁，而另一方则主张放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英国《独立报》1994年10月17日刊载的一篇文章对此作了以下的分析：

华盛顿、巴黎和莫斯科之间最近在海湾危机中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外交上的分歧。在外交分歧和大叫大嚷的背后存在着为未来在伊拉克争夺经济机会的一场斗争。

据该报披露，当时西方国家的不少石油公司已在与伊拉克进行试探性谈判，准备在解除制裁后与伊拉克签订合同，但美国法律禁止美国公司同伊拉克进行业务往来，因此美国公司已被排除在外。俄罗斯则已经与伊拉克达成了价值10亿英镑的合同来重建在海湾战争中遭到破坏的伊拉克油田。该报还援引美国当时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直截了当的话说：巴黎之所以希望联合国各成员国对伊拉克采取妥协态度，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

例二 1996年3月，美国以伊朗支持穆斯林极端分子

在以色列制造爆炸事件为由,对伊朗加紧推行孤立政策,并要求欧盟与美一致行动。但欧盟不但拒不接受,反而要求与伊朗举行“紧急对话”。路透社 1996 年 3 月 7 日伦敦电对此进行分析说:

美国认为伊朗是恐怖活动的策动者,希望欧盟放弃同伊朗举行“紧急对话”的政策,而采取措施完全孤立甚至制裁伊朗。……但现在欧盟不可能改变政策。……由于伊朗是有利可图的潜在市场,是重要的产油国,欧盟各国切望同伊朗发展商业和贸易关系。法国运输部长庞斯上周刚刚访问过伊朗。

例三 1997 年,美国突然大力加强对原来关系疏远的中亚国家的外交,将其作为美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法国《快报》周刊 1997 年 11 月 20—26 日一期载文指出,美国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争夺对中亚石油和天然气的控制和开采权”。该文说:“中亚地区可望在未来 20 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和天然气输出地。华盛顿可借此摆脱对越来越敌视美国的海湾国家石油的依赖。因此,美国开始对中亚国家领导人大献殷勤。”

例四 近年来,以色列在外交上一再对美国闹独立性,在阿以矛盾问题上拒绝完全配合美国的战略。法新社 1998 年 4 月 26 日耶路撒冷电从经济上找到了原因,它说:

以色列经济长期以来一直依靠美国资金的注

入，而近几年来，这种依赖性越来越小了，以致于考虑要减少美国的援助。

收支平衡和经济迅速增长使得以色列对美国的援助需求减少。据以色列银行统计，美国的援助目前仅占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在1986年则为10%。

以色列现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7万美元，高于西班牙的水平，以致以色列越来越没有理由保持美国对它的民用援助。

在内塔尼亚胡看来，从现在起，以色列不再依附美国这个安全网，它“加入工业化国家俱乐部”的条件已经成熟。

以色列货币谢克尔从下个月起将首次可在国外兑换。这是以色列独立愿望的象征。

以上几个例子说明，决定一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因常常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不同，政策就不同；经济利益改变了，政策也就跟着改变。因此，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不但要对经济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而且对政治问题也要追究其经济根源，以把握问题的实质。

从研究国际问题的需要出发，对经济基础的研究工作有其特定的要求和特点。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要“心中有数”。这个“数”指的是战略性数字，即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甚至决定意义的数字。研究一个方面的问题或一个国家，应随时记住有关的

战略性数字，这样才能得心应手地随时随地拈来应用。笔者记得 1983 年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长阿里·阿哈迈德·阿蒂加访华时，与笔者一见面便问中国有多少汽车。因为在他看来，汽车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石油的消费量，从而影响中国对石油的需要。对于研究能源问题的人来说，这样的数字不可不记。

其次，对数字要进行分析。虽然一般说来，各国正式公布的数字大都是有根据的，但实际上也存在不少假象，需要进行去伪存真的工作。关于这个问题，本书第七章中有专门论述，请读者参阅。

第三，数字要进行对比才能看出其确切的意义。例如，前苏联公布其劳动生产率在 1978 年比 1977 年提高 3.6%。这表示提高的幅度是大还是小？人们并不能据此作出判断。但只要看一下前苏联劳动生产率在 50 年代平均年增 7%、60 年代平均年增 6%，就可看出 3.6% 的增幅并不算大。有时，不仅需要进行纵的对比（与过去比），还需要进行横的对比（与别的地区比），才能对问题作出正确判断。例如，日本在亚洲的投资 1986 年比上年增加 64%。乍一看这似乎表明此时日本对外投资已改变其“重美轻亚”的倾向。但如对比一下同年日本对美国的投资增加了 90%，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事实上，在这一年日本总的对外投资中，亚洲所占份额已从去年的 11.7% 降为 10.4%，而美国则从 44% 增至 45.5%。

有一类问题，从表面看与经济因素关系不大，有时甚至与经济影响政治的常规相反。但若再深入一步看，其实

还是经济因素在起作用。

例一 1997 年英国大选前，由于保守党在执政的 18 年中大胆实行“冒风险的结构性改革”，使英国摘掉了六七十年代“欧洲病夫”的帽子，其失业人口也大大低于其他欧洲国家。当时英国经济被经合组织评为处于其“30 年来形势最好的时期”。应该说，这样的经济形势对保守党的竞选极为有利。但偏偏在这次大选期间，工党一直占据上风，并最终击败了保守党。这固然与保守党腐败、分裂的形象有很大关系，但还是有其更深刻的经济原因。据新华社记者当时报道：“（当地的）政治观察家们在分析这一反常现象时普遍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在经济回升中得到的实惠大大低于他们的期望值。以保守党政府最后一个预算报告为例，在被财政大臣称为‘能给保守党带来转机’的这个预算报告中，个人所得税率仅从原来的 24% 减为 23%，只及选民原来希望的一半，因而选民大失所望。这一失望情绪很快就反映在预算报告公布后举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保守党与工党的选民支持率的差距由原来的 24 个百分点拉大到 37 个百分点。”

例二 1996 年，秘鲁发生了日本驻秘大使官邸被占领的事件，《日本经济新闻》同年 12 月 19 日载文分析其原因说：“当然，导致这次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藤森总统为了恢复社会秩序而彻底扫荡游击队，因而引起了他们的愤怒”，“然而，藤森领导的经济改革也出现了一些偏颇。由于自由化和同外资进行竞争，迄今受到政府保护的企业不得不大量解雇员工。缩小贫富差距的工作并没有充分完成。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行自由化也引起了部分国民的不满”。“占

领大使馆的肇事者并不是几年前在山间活动的光辉道路游击队，而是以城市工人为基础的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而后者之所以“把锋芒直指日本”则是“由于日本急剧增加了对秘鲁的援助”。

但另一方面，如果把经济因素绝对化则又会导致“经济决定论”，从而陷入机械唯物论的泥淖。辩证唯物主义既重视经济基础的作用，又重视上层建筑的积极的反作用。在现实的国际生活中，上层建筑有时会起到重要的甚至主要的作用。例如文化、宗教、种族的影响就不可低估。

例一 信息能力是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世界知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把信息能力看作与军事能力、经济能力并列的“文化信息能力”。他在1997年1月与日本《产经新闻》记者的访谈中把日本当前政局中的混乱和前苏联的解体都归因于信息革命。《产经新闻》1997年1月20日刊载托夫勒的谈话说：

如今，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信息革命，比较它与过去曾带来两次巨大变革的农业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不同。

如今在日本见到的政治体制和官僚体制的混乱状况，就是从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次浪潮”向以信息社会为代表的“第三次浪潮”转移过程中发生的现象。

官僚体制一般只在能够统治商业组织的“第二次浪潮”时代有用。复杂的“第三次浪潮”的

经济社会的来临，就像政府不能限制使用互联网交换信息一样，我们会发现官僚的有效控制范围是有限度的。

谈起冷战结束，可以说信息革命的到来促使了苏联解体。西方的信息通过各种手段突破了“铁幕”，动摇了俄罗斯大众的心理。

虽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都出现了苏联解体的迹象。但是，信息革命不仅给经济方面，也给家庭构成等社会关系和政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们正处在比产业革命更加激烈的变化中。

例二 1996年9月，美国向伊拉克南部的防空基地发射巡航导弹后，在穆斯林世界引起了一片谴责声（唯一的例外是科威特），甚至平时与伊拉克长期不睦的国家也对伊表示了支持。美国《华尔街日报》1996年9月16日的一篇文章对此评论道：“伊斯兰世界的不满情绪更多地与宗教和文化因素有关，而不是与贫富悬殊有关。”

例三 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西方许多经济学家看困难较多，但日本神户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植松忠博从中国领导人的作风及群众与政府的关系，即上层建筑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改革的前景，从而抱乐观态度。这位曾于1998年在中国社科院担任客座研究员的经济学家在日本《世界经济评论》月刊1999年2月号刊载的题为《从北京看中国经济的光明前景》的文章中说：

与日本存在的因不良债权问题引发的紧缩性萧条相比，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可能会更加顺利地得到解决。作出这种判断的根据在于，中国的领导人凭借强有力的领导能力推动着改革，同时普通国民都确信政府的改革将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就是说，在领导人和国民之间存在着信任。

以江泽民主席为首的国家 and 地方领导人，努力直接面向 12 亿国民宣传改革的意义，以求得国民的理解和支持。在去年 8 月发生大洪灾时，江泽民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纷纷亲临抗洪一线，通过便携式扩音器，鼓舞那些奋勇抗洪的解放军战士和受灾群众“夺取抗洪斗争的胜利”。他们置身于国民当中，宣讲政策内容，寻求民众合作，同时也倾听民众的坦率要求，并在行政工作中加以考虑。领导人的这种举动，在当今日本是看不到的。

相比而言，日本领导人的做法明显有别于中国，这是一种正在疏远国民，由一部分人秘密协商来决定事情的方式。只要不纠正这种做法，无论更迭几位首相，也不论投入多少财政资金，日本经济也断难恢复。

必须说明，在本章上列的所有例子中，笔者为了集中说明问题，都只强调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但事实上，大多数国际问题都是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因此，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应将这两个方面结合

起来进行研究，才能得出全面的结论，否则便会看法不全面，甚至发生错误。

例一 上文所举以色列敢于顶撞美国的例子说以色列之所以敢于如此是由于它对美国援助的依赖减轻了。这当然是言之成理的，但其实并不全面，因为没有提到另一个重要原因，即美国犹太教选民对克林顿的牵制作用，法国《费加罗报》1998年5月11日刊载的一篇题为《美国无能为力》的文章专门谈了这一点：

内塔尼亚胡手中掌握着各种牌，他有什么理由要顺从美国？

这位以色列总理拒绝前往华盛顿讨论美国提出的和平新计划。他这样做并没有冒险。白宫没有能力惩罚他的这种傲慢行为，因为离国会中期选举只有6个月时间的克林顿已无能为力了。

克林顿在国会内的民主党朋友都知道，现在反对以色列是肯定要导致输掉这次选举的。信仰犹太教的600万美国人是不会原谅他反对以色列的，尽管这些美国人中的多数人对内塔尼亚胡的不妥协态度感到不满和生气。这也正是反对派共和党人立即指控克林顿总统对以色列人奉行“讹诈战略”的原因。

对克林顿的荒唐放荡行为进行的没完没了的调查使他在政治上变得脆弱了。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已不能开辟新的战线。